

南 帆

阐释的空间

海峡文艺出版社



阐释的空间

南 帆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125印张 2插页 241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80534—198—2

I·181 定价: 4.20元

BF83 102

目 录

价值·经验·选择

——当代文学中价值观念的一个初步描述…………… (1)

文学的冲突…………… (20)

陈村：才华与境界…………… (34)

《红高粱》印象…………… (49)

双重的对立

——读李杭育的《流浪的土地》…………… (53)

相反相成：《奔丧》与《瀚海》…………… (62)

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

——评王蒙的《要字8679号》…………… (72)

场外的对话

——读《夏天的审美触角》…………… (82)

小说中的当代意识…………… (87)

文学：审美与审丑…………… (96)

我们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114)

未来的文学…………… (117)

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124)

B 634905

1

轻松的代价·····	(131)
论文与专著·····	(135)
理论·摹仿·创造·····	(139)
颠倒的宽容·····	(143)

变革：叙述与符号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小说艺术分

卷·导言》····· (148)

小说意识的解放

——评《城疫》、《黑马群》、《平安夜，平安

夜》····· (168)

小说的虚构——“可能”的选择····· (177)

象征与氛围

——读杨少衡的《慧星岱尔曼》····· (190)

象征：虚实之间

——评《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爸爸

爸》····· (196)

寓言的构成

——读何立伟的《天下的小事》····· (207)

小说语言：功能的开发与实验····· (212)

小说与感觉····· (217)

现实主义：涵义、范围与突破····· (219)

作家，还是公民？····· (234)

对话的可能····· (239)

读者是什么？····· (243)

专家与大众读者·····	(249)
先锋文字与大众文字·····	(253)
媚俗：艺术的倾斜	
——评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	(269)
批评之径·····	(284)
批评：审美反应的阐释·····	(287)
批评自述·····	(296)
理论的阅读障碍·····	(309)
否定的效应	
——关于一种批评方式的对话·····	(312)
方法与模式·····	(318)
诗与诗论·····	(323)
“诗味”的探寻	
——评蔡厚示先生的《诗词拾翠》·····	(324)
个性：理论模式的选择	
——评吴亮的《文学的选择》·····	(326)
文艺社会学的当代轮廓	
——读《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	(334)
跋·····	(346)

价值·经验·选择

——当代文学中价值观念的一个初步描述

当代文学聚集了来自我们身边的呐喊、渴求、忧虑或者愤懑。从这些不无嘈杂的声音中，我们可以辨识出种种不同信念的相互交错、对峙乃至冲突。这毫不奇怪。我们面临着思想与个性的全面启蒙。各种价值观念都可能陆续地粉墨登场。这时，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思索、经验与气质对之加以选择、接受乃至再创造。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许多差异乃至“代沟”必将要诉诸文学。

既然如此，价值观念则构成了一个整理当代文学的内在尺度。

《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曾经引人潸然泪下。在碌碌的日子里，中年不是意味着成熟与富足。这不过是一个毫不显眼的过渡阶段。瑰丽的浪漫早已结束，倚老卖老资格却远未获得。这时，多数中年人不过日复一日地操劳于繁重的

公务与家务之间。《人到中年》无宁说以特殊的艺术光芒照亮了多数人刻板单调的中年生涯。一段切实的、辛酸的人生被作家唤醒了。陆文婷身上甚至汇拢了一个社会性的吁请：社会福利应当给予这批社会中坚者以应有的照拂。

可是，当我们考察到陆文婷的人生方式与人生态度时，这个人物却忽然显出了某种贫乏与苍白。这是一个无力以自己的个性力量置身于社会的人物。温柔敦厚、忍气吞声乃至逆来顺受——这些传统美德无形中掩盖了她的懦弱。同医院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时，陆文婷的精神上甚至缺乏活力。相对于克服种种具体困难的毅力，她从总体上改造环境的魄力太小了；相对于选择专业的坚定与果断，她在“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一类人面前太软弱了——她的蔑视只能含而不露地埋藏于心。总之，陆文婷一方面在兢兢业业中透露着令人感佩的坚韩；另一方面，她又缺乏作为一个觉醒的主人所应有的自主精神。

自主精神的萎缩已经消融于陆文婷以及陆文婷们的日常态度。他们不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对社会现象作出直率的判断。天长日久，他们甚至可能因为长期的迟钝麻木而失去用以观察的眼睛。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认为是自觉的选择，毋宁说更多的是处于一套强大价值观念体系的支配之下。虽然一时很难清理出这套价值观念体系的总体轮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一系列熟悉的准则：克己奉公，平易待人，服从领导，安分守己，不计名利，不事竞争……作为这种价值观念的体现，陆文婷以及陆文婷们的真诚与无私十分可亲可敬。弥足珍贵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准则并不因为环境的压力或腐蚀而被改变；同时，同样作为这种

价值观念的产物，陆文婷以及陆文婷们身上的盲目乃至奴性也无可掩饰。他们的“克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他们将由于遵从流行的观念而带上抑制个人的习惯。他们不同程度地蔑视自己的感触，蔑视自己的眼睛，蔑视自己的思想、情感，乃至蔑视自己人生的正常欲望。

《人到中年》这个标题富有象征意味。我们发现，一些可能同陆文婷构成系列的人物性格竟不约而同地出现于一批中年作家的小说中。作家对于同龄人的熟知固然是个原因，不过，这些人物是否多少也流露出中年作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

我们在另一些中年作家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处于严峻的选择关头，一批中年主人公将把陆文婷式的人生态度凝聚为一种操守。而且，这种人生态度中令人感动与令人叹息的两方面成份也同样可能结晶于他们操守之中而形成两重性。王蒙《布礼》中的钟亦成在信仰上无疑具有一种可贵的坚定性。他蒙受了二十余年的不白之冤，但却没有因此放弃信仰而甘心沉沦。面对“灰影子”玩世不恭的嘲弄，他始终拥有足以自豪的精神支柱。由于这种坚定，钟亦成的灵魂并未被外在的压力挤瘪。可是，在这种操守的另一面不是也同样包容了天真与盲从吗？钟亦成迟迟没有看出周围的一切同导师的理论或《国际歌》理想之间的巨大差别，他无条件地信任领导的意见。这使钟亦成很难在精神上解放自己。他一方面竭力视自己为罪人，另一方面则虔诚地等待着空中伸来的饶恕之手。换言之，他无力启动个人的思想力量超越愚昧的流行观念。我们不应仅仅将这种操守的能量局限于逆境中的坚持。诚如钟亦成所自白的那样：假如易位而处，他也可能毫

不迟疑地宣判别人为政治罪人——这种危险不是也同样来自操守的坚定？

张贤亮的《灵与肉》也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孤苦与屈辱，许灵均仍然毫不迟疑地拒绝到海外继承家业而宁可坚守在贫瘠的土地上。在许灵均那已经变得木讷的言行后面，我们再度遇见那种令人肃然的操守。与其说小说笼统地否定投奔海外的行为，毋宁说作家为之感动的是这种操守本身。但是，我们在许灵均的坚定之余多少还觉察到一种人性的薄弱。仿佛他的气节可能磨钝了某一方面的感触——许灵均对于父子之情无动于衷。尽管他不曾得到应有的父爱，但年迈的父亲对儿子的眷恋却不难想象。而且，许灵均并不寡情。妻子的信赖与乡亲的相助令他时时铭记于心。因此，他对父亲的冷淡只能如此解释：不可能存在同坚定的操守并不一致的情感。在维持人物操守的纯洁与绘述深沉的内心世界之间，作家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前者。这无形中简化了许灵均在人生选择之际情感纠葛的复杂性。屈从于理念而忽视人性——这与其说是艺术上的疏忽，毋宁说作家在想象他的理想人格时无形地为熟悉的价值观念所支配。

如果说《灵与肉》的生硬之处尚且隐而不彰，那么，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则明显地流露出以观念统一情感的迹象。范汉儒毅然斩断了他同陶莹莹的相爱，这个行为表明了一种坚定：即使狱中共同患难所孕育的爱情也无法打消范汉儒原先存在的牢固观念。在范汉儒心目中，杀人、流氓、盗窃都可以饶恕，唯独叛国不可谅解——而陶莹莹入狱之前居然曾企图越境逃跑。这个污点象个楔子牢牢打入他们俩的关系，以至他们历经曲折之后依然再度分手而不复相

见。

一篇犀利的评论曾经指出：小说混淆了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光荣的祖先以及特定时期政治路线这些涵义不同的概念。不加区分地将这一切一概称为报效尽忠的对象，这只能带来情感本身的混乱。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范汉儒沉浸于自己的操守时已不可能清醒地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这时，忠贞与迂腐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差。这是范汉儒的性格特征：观念上的坚定远甚于人情体的具体体察。陶莹莹委屈也罢，悔恨也罢，思念也罢，这一切早已打上了四个字：不可宽恕。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倾向：观念先于体验。接受观念远比接受复杂的生活更为自觉。归根到底，究竟人制造了观念还是观念制造了人？

当然，左右多数人爱情选择的并非政治筹码。个人的志趣、理想、人生态度或家庭观念——总之，个人的价值观念时常起了更为直接的作用。那么，让我们转移到中年作家的爱情小说中考察他们的爱情观。我想提到两篇曾经众人瞩目的小说——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借助他人的眼光呈现了一对夫妻的几个无言的生活片断。尽管小说并未说明更多的来龙去脉，我们却明显地从中体验到一种一贯的坚贞挚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无论人生途中曾遇到哪些风风雨雨。这显然凝聚了作家心目中理想的爱情境界。爱情不是接受，而是尽量给予；爱情不是双方炫耀个性，而是将自身消融于对方之中；爱情是温暖、和谐，而不是相互不驯地比肩而立。这时，我们又可以透过另一个侧面看到他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这些人的内心过

于理性因而缺乏动人的激情。《爱，是不能忘记的》将一个敏感、多情而又痛苦的灵魂从冷静的外表后面轻轻地托出。那些干枯的心灵很难想象：一套契诃夫选集，一条共同散步过的柏油马路竟能负载那么多的相思。然而，我们在主人公隐秘的情感中仍将发现一种自我克制——而不是自我放纵——的倾向。他们的恋爱已经滤尽了肉体上的骚动，甚至也不指望今生在现实中相聚。双方仅仅是不计任何功利地苦苦思念着。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已经明显地带上了宗教色彩——将个人的一切奉献于爱。

当然，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复杂——这些也同样属于许多中年作家所热衷的主题。不过，也许由于习惯的价值观念已经潜入他们的思维方式，一些作家甚至在倡导人道主义时仍然不自觉地以观念代替人的理解。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直至《5.19长镜头》，刘心武不断地呼吁着人类的博爱精神。这些小说中，作家的拳拳之心甚至比人性的深刻剖析更为感人。而且，当博爱的观念推广至一定程度，它可能同人性本身发生冲突。一些人对刘心武《公共汽车咏叹调》中老先生慑人的眼光不以为然。不错，确是老先生眼中所包含的理解与相互宽容的祈求使公共汽车开向了下一站。可是，既然争吵的每一个人都拥有无可否认的理由，那么，博爱只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廉价的临时润滑油。以博爱这个古典概念规范人性，而不是全面地考察人性以重新建立人的观念——这种理解人生的方式仍然同他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一脉相承。

在当代文学中，中年不仅是一种年龄层次。它还意味着一套价值观念，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解生活与创造生活的

方式。

二

六十年代末，一大批年轻人的躯体从疯狂的政治旋涡中甩了出来。他们怀里揣着一些狂热的政治概念与光荣的梦想，星星点点地散落到广袤的乡村。这个过程同样伴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运动形式：上山下乡。从此，我们的国度增添了一种号称“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国策延续了近十年，这在整整一代人的经历中烙下了一个重大的印记。

时至今日，多数知青已陆续返回城市安家立业。上山下乡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正逐步地平息。可是，在一代人的精神深处，这个特殊的印记并未随之轻易褪去。他们终于明白：虽然打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当年的起点，但是这不应简单地视为无谓的生命浪费。从乡村所得到的的人生经验将长久地存留于他们内心，不断地酝酿、蜕变、成熟，以至打破与重新确立他们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这一切当然也将组成当代文学的一页。

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将一批出身于知青的作家纳入一个共同的考察视野。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时常将知青的特殊生活作为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一系列小说不约而同地绘出一条情感经历上的有趣弧线。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许多作家都将知青生活视为苦难的渊薮。远离亲人之后，严酷的乡村现实迅速地粉碎了知青的一切幻想。一旦失去政治与经济的庇荫，他们很快地尝到了

艰辛、难堪、前途渺茫乃至生计无着的滋味。于是，多数知青开始了返回城市的种种努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感受了失望、受辱、欺骗、孤立无援，以及人心的阴险与狡诈。对于这些现象的痛苦回忆与切齿的诅咒，这几乎是当时知青题材小说的共同主题。

不过，我所重视的是潜藏于这些小说后面深刻的幻灭感。从下乡到返城，这些知青对于社会、政治或者人生的理想信念一个又一个地成为泡影。他们先是惊讶于乡村与想象的距离，继而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幼稚，最终则清楚地意识到一种令人颓丧的幻灭。甘铁生的《聚会》曾出色地表现出后期知青精神状态的凄惶之感：一群返城无望的老知青相聚喝酒，他们在酒桌上甚至连一个逗趣的笑话也说不成——所有的笑料都已为苦涩所浸透。强作欢颜的气氛打破之后，这些人只能被抛入自怜的哭泣与无言的空虚之中。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往下跌落的情绪中，当初为之热血沸腾的信念与决心已荡然无存。这个过程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代人在乡村领受了迷信所带来的沉重惩罚。急剧膨胀的天真、盲从与狂热导致了骤然的幻灭。这使他们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继续接受中年一辈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观念上的先验突然将坚定引向了盲目，盲目的苦果终于导出了醒悟。不过，由于生计与出路的胁迫，多数人尚且无暇从人生经验的高度重视这种盲目与醒悟。于是，这个转折隐匿于返城的骚动背后以至很少作家能够及时地省察。

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似乎是个提示：唯有匆匆地返城之后，这些知青才可能喘口气进而从容地反省人生。奔赴城市的心理惯性一旦趋于平定，他们则可能将乡村与城市

结合成一个更大的背景以思索人生。由于空间的逼仄与人情的纠葛，刚刚回到城里的陈信突然开始羁恋偏远却又空旷明朗的北方天地。这种情绪波动毋宁说预示着价值观念的调整。人生的追求、奋斗、取舍与理想都将在新的参照之下得以修正。

于是，一批知青作家重新回忆当年的知青生涯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至韩少功的《飞过蓝天》，拓荒的豪迈与理想的光芒悄悄地从失望、阴郁与愤懑中透出。在孔捷生《南方的岸》中，主人公甚至毅然地回到当年的橡胶园——仿佛是城市生活反而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内在地影响知青作家价值观念的乃是一种深厚的平民意识。可以说，乡村的大爷、大嫂、汉子、放牛娃——他们的人生已经有机地融于这些作家的生活理解。一些情感似乎源于对逝去生活的回忆，但这些情感注入他们价值观念之后却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些作家很少附庸风雅地炫耀交响乐、迪斯科、堂皇富丽的客厅、深浅莫测的清淡、高级轿车的型号、优雅可人的教授女儿等等，他们更易于为那些质朴乃至粗俚的言行和黑黝黝的脸庞所感动。对于那些来自底层的道德文化，他们不再仅仅报以贵族式的冷笑；对于平民中的愚昧与陋习，他们也常常流露出耐心与宽容。或许是由于情绪上的沟通与默契，这些作家常常从芸芸众生的忙碌中触摸到各种人生真谛。对于普通人的亲切理解，这种平民意识可以视为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它来自底层生活的直接体验，而不仅是某种时髦理论的产物。在那些木讷朴实的人物中间把握住真正的人生，这对于一代人当初的幼稚、狂热与

书生意气乃是一种无形而又切实的矫正。

一批记述知青与老乡之间纯朴情谊的小说标志出作家情绪的转移。无论是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还是陈村的《蓝旗》、《给儿子》，小说都显露着对于乡村故人的真挚怀念。那些老乡不再是知青周围阴冷的环境之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成了回忆中的情感对象。那些笨拙的言辞举动虽然不无可笑，但其中却蕴含着动人的暖意。这些小说所呈现的不过一些断断续续的记忆片断，但它们却表现出作家兴趣的一个新的指向——他们开始为那些平凡人生后面所闪烁的内蕴所吸引。随后，李杭育、铁凝、王安忆都曾在一批小说后面竭力体会与提炼这些普通人所遵从的生活准则。可是，假如考察平民意识对于作家人生观、理想人格以至思维方式与感觉方式的全面渗透，我想特别地提到阿城与张承志——这当然同屡屡出现于他们小说的“我”不无关系。

阿城在冷静凝练的叙述后面不时透出一股超然，而且，阿城又曾公开表露他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不免使人们敏感于他小说中的道家风味。然而，阿城小说的主调无宁说仍是一种世俗精神。在叙事绘状之中，阿城往往不放过俗人的乐趣——喝酒，抽劣等烟，上馆子，逗狗，观看公鸡母鸡调情等等。或许由于厌恶浪漫情调，阿城小说甚至有意不避鄙俗粗鲁。撒尿、光身子洗澡以及由此而来的调侃，诸多不雅之处在阿城小说中寻常可见。这并不是多余的佐斜。相反，阿城旨在借此强调一种底层的感受方式与兴趣所在。日出而作，业余则饮食男女，底层人的人生正是如此默默地展开。与这种世俗的人生相应，阿城小说中也难得出现叱咤风云或大潮起伏。《棋王》不过叙说了吃与下棋。《孩子王》也无

非读书识字。《树王》中肖疙瘩虽然一身本事，但他终究也不过执迷不悟地护卫着一棵大树。出现于小说中的骑手、知青、士兵、山野人家，这些人也无非本分地谋生、自食其力而已。然而，倘若将这些灰头土脸的普通人加以汇拢，他们之间则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本色：求根本，务实际，从衣食做起。相形于当年的风云变幻与高头讲章，这种朴素的世俗精神显然是一种默默的抵制与抗衡。它意味着平民阶层的价值观念。阿城所以能够从周围凡夫俗子的事迹中抽取出这种价值观念并予以认同，这种平民意识同乡村生活的磨练密切相关。

在阿城心目中，平民决不仅是毫无个性的配角。我们不能狭隘地将他们的价值观念理解为庸俗的见利忘义。相反，即使这种价值观念因为朴素而不合时尚，他们却仍将执拗地予以实践，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这时，我们也将从这些平民身上看见种种个性、气节与操守。肖疙瘩终于因为一棵大树被砍郁郁而亡；“我”宁可失去来之不易的教师职位，也不肯迁就那些误人子弟的教材；嗜棋如命的王一生在车轮大战中以盲棋胜了冠军等九人，但他却不愿疏通关节参加棋赛。诚然，这些人的作为多半称不上济世匡时的壮举，他们也缺乏激烈的言辞与义无反顾的行为。这一切仍旧也是以平民的方式表现为一种固执，一种倔强，一种不识时务。然而，阿城却从中发现了令人钦慕的人格。这种人格甚至使刘邦项羽这些帝王将相黯然失色。阿城暗自庆幸生活使他得到结识这种人格的机会。《棋王》末了说：“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

张承志对于草原牧民的炽热情意一开始就体现于他最初

发表的一些小说中。相形于阿城的不动声色，张承志的艺术个性具有充沛而且躁动的激情。当他直抒胸臆地吟诵牧民情谊时，外露的情感使张承志更象一个浪漫诗人。然而，《绿夜》与《黑骏马》也许完成了一个突破。张承志进入了牧民的文化结构深处，逐步置身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于是，草原上的男人不仅仅是豪爽好客，草原上的女人也不仅仅是坚强而又体贴。张承志开始探究隐于他们古朴生活方式之后的一整套人生准则，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重塑自己的艺术个性。在《老桥》、《春天》、《晚潮》、《残月》、《戈壁》、《黄泥小屋》这一系列小说中，张承志的考察范围扩大至整个西北地区。从宗教信仰、思维结构到情感趋向、道德观念，一种未曾体会过的人生方式渐渐地浮现了。走出作家主观热情的光晕，额吉、奶奶、骑手、母亲、守林人、山民、奥云娜与索米娅——这些人物都在一种共同的人生方式中显出了坚实的质感。这种人生方式使这些男男女女在精神上联成一体。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与人格，坦诚、厚道、朴实、坚忍——这些品格通过一系列善恶、尊卑、荣辱观念具体贯注于日常的各个方面。这时，他们的人生方式显出了坚韧的生机与浑厚的力量。似乎为这些人生方式所同化，张承志小说借助“我”所显露的刚猛之气——这种刚猛之气在《大坂》与《北方的河》中都曾发出逼人的光芒——不时地汇合于那坚韧的生机与浑厚的力量之中。牧民与山民也许正平静地实践着他们世代相传的人生。可是，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外来者，张承志却从他们那质朴无华的存在方式中感受到灼人的热力、潜流般的情感与深沉的灵魂。这将会时时蒸发了那股刚猛之气中的浮嚣与莽撞，从而使之在强悍